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
2004年6月，頁443~455

BIBLID1012-8514(2004)33p.443-455
2004.5.21收稿，2004.6.2通過刊登

§書評§

如何審視鏡像中國？

評介《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91p.

邱　澎　生*

隨著明清經濟史研究成果的不斷累積，近十年來，學界對近代歐洲經濟發展「獨特性、進步性」的相關命題，開始有著更深入的反省與更全面的質疑，直接挑戰著種種以「西方中心論」視野觀照下的中國經濟史圖像。[1]儘管沒有發生十八世紀末年以降陸續普及於英國與西歐的以工廠制與機器大規模生產等特徵為主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成長模式，但是，明清經濟是否真的不曾出現也有同樣重要意義的經濟成長？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們主張：明清中國經濟只出現經濟總產量增加的「廣泛性成長」（extensive growth）而沒發生單位經濟生產力提昇的「密集性成長」（intensive growth），或者形容此現象為始終未能脫離「沒有發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與「內捲化」（involution）困境的經濟成長，[2]故而不可能與西歐模式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個人網頁：http://www.sinica.edu.tw/~pengshan/。
Chiu, Peng-sheng,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 Jack A. Goldstone,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no.4 (1998), 249-284;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本書中譯為：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2 王業鍵，〈明清經濟發展並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期（1983，

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然而，近十年來明清經濟史研究的新發展趨勢，則是直接質疑這些既定看法，甚至主張明清中國有著另外一個與西歐模式不同但卻有著同等重要意義的經濟發展模式。[3]對這樣問題抱定不同立場的學者們，在這三、四年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辯。[4]到底明清經濟發展註定是一條受限人口壓力或技術發明而未能似西歐般完成工業革命的失敗道路？還是確實有其值得注意的成就，甚至是發展出一些我們現今已然陌生而不易辨識的不同型態經濟發展道路？我相信這會是一場方興未艾的論辯。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下文簡稱《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這書至今雖已出版五年，但是，仍然有其重要性，特別是隨著此書中譯本甫於臺北問世，[5]中文讀者更可容易取讀

廈門），30~39、54；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50-198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119~121。對黃宗智「沒有發展的增長」概念的檢討文章不少，下文則很可參看：行龍，〈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兼論黃宗智「沒有發展的增長」說〉，《歷史研究》4 期（2000，北京），17~25。

3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本書中譯為：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李中清、王豐著，陳衛、姚遠譯，史建雲校訂，《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北京：三聯書店，200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此書在海峽兩岸出版了兩個不同中譯本，大陸譯名《大分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史建雲譯；臺灣譯名《大轉向》（臺北：巨流出版社，2004 年即將出版），張寧等譯。

4 這類文章頗多，但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仍是以下兩篇：黃宗智，〈發展還是內捲？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4（2002，北京），149~176；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回應黃宗智先生〉，《歷史研究》4（2003，北京），3~48。

5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主編，古偉瀛、郭慧英、宋家復、李榮泰、費絲言、

玩索此書精義。《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是部收錄五篇不同作者論文的合集，[6]這本論文集的焦點，放在「對中國歷史的書寫」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認識」兩者如何扣合關連與緊密互動，本書兩位編者Timothy Brook（卜正民）與Gregory Blue宣稱：「我們不是要討論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也不是要檢視現今東亞的經濟成長」，而是要探究資本主義「如何被視為是一種歐洲特有的社會形態」，以及資本主義「如何成為形塑我們認識中國相關知識的世界體系」（頁5）。

本書兩位編者強調：無論西方各種思想派別如何貶損中國的重要性，但早自十三世紀馬可孛羅（Marco Polo，1254~1324）描繪元朝中國「忽必烈汗」（Khublai Khan，1261~1368）的繁華景象以來，中國即一直是「歐洲人密切省視的對象」（an object of intense contemplation）；然而，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歐洲人對中國的想像卻由原本渴望親近、尋求貿易的「繁盛樂土」，淪為一個正好足堪襯托歐洲歷史發展「進步性」的落後國家與文明，不僅屢被冠上為「中國歷史的停滯性」（Chinese historical stagnation）的污名，甚或被斷言是「中國先天上即劣遜於西方」（China was intrinsically inferior to the West）（頁1~4）。這種對中國認識的鉅大轉變，更由歐洲向外波及許多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加上富國強兵的迫切願望，使這些中國人自己也逐漸接受了中國「長期停滯性」與「先天次等」等歷史想像。

基於這樣的觀察與體會，本書設定了兩個目標：一是檢視那些將西方資本主義視為是世界歷史發展模範（the norm for the world）的各種文化與意識形態思潮，辨識那些思潮如何對中國歷史提出種種曲解（distortions）。二是由辨識曲解出發，進一步設想更能深入理解中國社會的有用視野。本書的基本立場是：「若要更能理解中國，一定要回

邱澎生合譯，《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

6 五篇論文分別為：Immanuel Wallerstein，〈西方、資本主義與近代的世界體系〉；Gregory Blue，〈中國與近代西方社會思潮〉；Timothy Brook（卜正民），〈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代史書寫〉；Francesca Bray（白馥蘭），〈邁向一種批判性的非西方科技史〉；王國斌（R. Bin Wong），〈農業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當代遺緒〉。

顧過去這段將近代世界歷史視為是『歐洲奇蹟』的歷史論述，從而提煉出能夠減少歐洲中心式（Eurocentric）的不同世界史視野」（頁5）。

編者認為本書收錄的五篇論文主要在回答以下三項問題：一是十四至十六世紀之間在歐洲成形的「資本主義秩序」（capitalist order），這個所謂歐洲資本主義的早期形成過程，究竟有何獨特性？二是針對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轉型而提煉成形的種種觀念和理論，究竟如何影響歐洲人與亞洲人看待中國歷史的方式？三是在體察到我們認識中國方式深受西方資本主義觀點影響之後，究竟要如何超越這種對中國歷史的曲解（頁5~6）？以下我將分別介紹五篇論文的主旨。

Immanuel Wallerstein（中文通譯華勒斯坦，後文簡稱華氏）文章，評介諸家流行的西方資本主義歷史解釋。華氏基本上肯定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獨特性，[7]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經濟系統，這種系統「具有持續積累資本的基本動力」，他並借用博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對這種「奇特」（curious）經濟系統的界定方式：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經濟系統不再被嵌入於社會網絡關係中，而是社會網絡關係被嵌入於經濟系統內」（頁56）。[8]

華氏認為，歷史上許多經濟系統都具有「原型資本主義」（proto-capitalism）的成份，無論是商品生產量的增長、生產者與販賣者追求商業利潤、將資本投入生產活動、雇佣勞動的發展、適合資本主義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en）等現象，其實都不只出現在歐洲

7 Andre Gunder Frank 對此點則有強烈批評，他認為近代歐洲其實並不獨特，華氏這種觀點仍然不脫「歐洲中心論」的偏見。見 Frank 專書《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特別見頁 79。

8 語出：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57。本書已有中譯：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博蘭尼有關「經濟」與「社會網絡關係」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變遷的提法，在下文有更豐富的討論：Karl Polanyi, “Aristo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in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64-94。

（頁34）；早在西元一千五百年以前，世界某些區域之間即存在發達的長程貿易，遍布長程貿易線上的不少商人群體，也並不缺乏「企業家精神」（頁53），這些都非獨存於歐洲文明。然而，對華氏而言，那種「具有持續積累資本的基本動力、社會網絡關係被嵌入於經濟系統內」的近代資本主義系統，則的確只出現在十五世紀後的歐洲。

如何回答近代資本主義獨獨只在歐洲興起的這個「真正難解的大謎題」（a genuinely puzzling question）？[9]華氏在提出其主張的「輻輳性解釋」（conjunctural explanations）之前，先批判了諸種通行的「文明性解釋」（civilizational explanations）。被華氏歸類為「文明性解釋」提法的學者不少，[10]這些學者儘管分屬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都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結構性秘密」，主要歸因於某種「導致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出現」的歐洲「長期『文明性』特徵」（頁35），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新教倫理」（the Protestant ethic）最為其中典型。華氏質疑：如果真有內在於歐洲文明的資本主義特徵或是「深層根基」（the deep root）存在，何以歐洲要到十六世紀甚或是十九世紀才真正出現英國式的近代資本主義（頁42）？華氏認為，歷史上其他經濟系統其實也都各有「內在含括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contained" capitalism tendencies），問題在於：「內在含括於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究竟是如何衝出那些限制他們發展的障礙？」（頁43）華氏提供不同於上述主張的「輻輳性解釋」：十四至十六世紀

9 語出：Paul Sweezy, "A Rejoinde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Rodney Hilton ed., 106。

10 華氏引用這些學者的以下著作：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58);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4);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1760 A.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lan MacFarlan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Alan MacFarlane,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Robert Brenne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 H. Ashton and C. H. E. Philpin ed., 213-327; Luciano Pellicani, *Saggio sulla genesi del capitalismo: alle origini*

間的歐洲，發生了諸如封建領主（seigniors）、中古國家、教會以及蒙古人扮演歐亞大陸「北方通路」勢力的衰微等因素的變動，因為這四種因素的同時匯集輻輳，才使歐洲能夠突破那些限制「內在含括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諸種因素，近代資本主義才能成功在歐洲發展。

Gregory Blue（後文簡稱布氏）的〈中國與近代西方社會思潮〉，追溯了過去八百年來西方人如何解釋中國文明本質及其意義的變遷梗概。布氏將這個對中國文明評價的變遷過程區分為五大段：中古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驚異艷羨」（wonder）、十七世紀與早期啟蒙時代的「褒貶互見」（mixed opinions）、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文化聲名江河日下」（the decline of China's cultural reputation）、後啟蒙時代「種族主義者恐華症」（racialist sinophobia）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遠景」（new vistas）。布氏討論相關文獻甚夥，限於書評篇幅，無法細數。

布氏在文章後段則集中分梳了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所謂「歷史穩定性」（historical stability）為數千年中國文明基本特色的相關問題。不同時期歐洲知識分子在討論中國文明「歷史穩定性」時，其實背後各有不同的「本土」關懷。十七世紀歐洲思想家主要關心當時歐洲社會秩序混亂的問題，「中國經驗」正好能提供借鑑，儒家「德治」影響下的「歷史穩定性」，被視為是中國政治清明、社會秩序穩定的結果，正好可用以諷誡當時貪婪的歐洲君主。但當十八世紀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人評論歐洲君主政體而援引「中國經驗」時，當時法國專制王權已成孟氏的批判重心，中國的「社會秩序穩定」乃被解讀為專制王權強行壓制、民意無從宣洩的惡劣政治表徵；孟氏甚至還將中國這種專制政治（despotism）歸因為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不可抗力」自然因素的影響。所謂的「歷史穩定性」，在孟氏看來，其實只是反映國民在專制政治、自然因素限制下而使個人失去法律保障乃至自由意志的結果（頁86~89）。下及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格思（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della modernita (Milan: Sugar Co Ediz, 1988)。

約翰．彌爾（John S. Mill，1806~1873）等人，也各因不同的「本土」關懷，而對中國經濟狀況有更多描繪（頁89~94）。在布氏看來，這些人對中國經濟結構所做的「分析」，不僅「對中國複雜的財產權形式與私人財產權性質缺少基本的理解，更對中國歷史上豐富的都市生活經驗、農業生產關係、鄉村地主作用，乃至全體經濟發展實況，全都罕見檢驗。這些對中國的疏漏觀察（oversights），反映的主要是他們對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分析，特別是他們對當時歐洲勞工階級革命迫近問題的預測與關心」（頁95）。

其後，韋伯在「世界諸宗教」議題下對中國思想文化與社會階層做了較多分析；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年代的蘇聯，也曾發生有關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本質的辯論，提出不少對中國歷史的新思考。但是，在布氏看來，韋伯其實「低估了傳統中國倫理思想的複雜與豐富，以及傳統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動力與成就」（頁99）；蘇聯的「前近代中國」歷史大辯論，雖然有偏重「生產條件影響社會關係」和「特定社會形成過程中主要階級矛盾」的兩大流派，也的確在理論上碰觸到不同歷史發展動力的可能性，具有突破「歷史穩定性」那類中國論述的潛力，但可惜並未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後得到進一步論證（頁108）。

Timothy Brook（卜正民）的〈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代史書寫〉，討論近代日本、中國、俄國等學者書寫「中國史」的演變歷程，區分了四類書寫傳統：第一波的「當代」中國史書寫傳統；馬克思史學的「封建社會」論述公式；韋伯學術影響下的「亞細亞主義」（Asiaticism）論述；前近代中國的「已嵌植的資本主義」（embedding capitalism）論述。在卜氏看來，這四類中國歷史論述其實都具體反映了「資本主義概念如何影響二十世紀中國與日本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與書寫」，這些中、日現代史學家們，透過「資本主義」這個外來語，透過認識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不是什麼等思考與論辯過程，而對「中國整體歷史進行了理論化的過程」（頁110）。

康有為、梁漱溟、梁啟超、嚴復、夏曾佑，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下的「國粹」學派、「疑古」史學，以及受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影響的日本「東洋史、西洋史」史學教育體系、內藤湖南的宋代十世

紀中國為「近世」說等等，都被納入「當代」中國史學書寫傳統做分梳。日本學者譯介的馬克思主義原典、李大釗、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陶希聖，乃至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及周谷城、呂振羽等相關著作，則被納入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階段論、封建社會」論述傳統做討論。第三支現代中國史學書寫傳統，表面上看主要是受到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蘇聯分析前近代中國社會本質的影響，但在卜氏看來，其實這支傳統更受韋伯派學者主張的中國「封建官僚階層」（feudal-bureaucratic stratum）論述牽引而不自覺（頁140~142）。Karl Wittfogel（1896~1988，譯名或作魏復古）、王亞南、李季等人的「東方治水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提法，都屬這派史學書寫傳統。第四支現代中國史學書寫傳統則可名為「已嵌植的資本主義」論述，無論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史學界所討論的諸種「中國史時代區分論戰」，或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史學界的「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乃至余英時自一九八四年以降援引韋伯「新教倫理」命題對明清「商人精神」所做的思想文化史分析（頁153~154），都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工商業作用有更多著墨。

儘管中、日兩國史學家對工商業衝擊傳統中國社會程度有不同評價與立場，而且，並非所有學者都接受「封建社會」這個「十九世紀馬克思—列寧式術語」（頁155），中國歷史解釋中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之爭，則仍會持續下去。卜氏相信，當現代資本主義「現代性」在目前中國大陸如火如荼開展之際，西方歷史經驗愈來愈難再被視為是「歷史」（History）的開端，當代史家在形構史學解釋中的「資本主義」因素時，必將會有另一番新局面。總結來看，「西方資本主義概念持續主宰了二十世紀大多數史學家所建構的中國歷史」，卜氏主張：只有將所謂的「西方興起」這個歷史學議題，改視為一個更像是「地方性的現象」（a local phenomenon）而非是一種「全球命運」（a global destiny），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避免二十世紀史家的覆轍（頁157）。

Francesca Bray（白馥蘭）〈邁向一種批判性的非西方科技史〉，在簡論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關中國科技史研究的

特色與限制後，提倡並示範了如何重估中國科技史的新的基進（radical）取徑。白氏根據自己多年研究的傳統中國食糧栽種以及絲、棉紡織生產歷史為基礎，界定了她所謂的科技史研究基進取徑：「不要把科技現象窄化為單純的效率與否的考量，也別再理會西方資本主義理性（capitalist rationality）那套研究範式，要用更符合歷史實際、更富創意的提問，去考察當時人如何選擇科技發展方向的價值與意義。我們應該將科學技術重新嵌植在本地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考察科技如何形構平民物質世界中的各種工作流程，或是科技如何造就改變了各種社會人際關係」（頁207）。

白氏對傳統中國物質文明進行考察，將科技發展連繫到中國自身的文化、經濟與政治條件中。不論是西元九到十三世紀間所謂「唐、宋變革期」發生的中國經濟重心由華北轉到華南的現象，或是十五世紀以後明清江南等地商品化現象逐漸主導農業與手工業生產的過程，一般學界習慣探究「單位生產量」是否面臨發展上「頓挫」、停滯，或是比起近代歐洲如何、為何落後等課題，白氏認為，這些問題其實都已缺乏新義，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生產總數量成長後所帶動的「生產組織方式」變遷，究竟如何和政府提倡的「男耕女織」等意識形態互動？究竟如何重塑既有社會人際關係以及家庭內的性別分工觀念（頁167~168）？[11]

對白氏而言，科技不只是生產效率高下的問題，而更是種種「科技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s）的展現，與科學技術有關的活動與產品，其實可被視為是分屬政府與民間的各種團體與個人，在各自不同的意義與價值觀下，面對科技「所展開的持續對話與爭論」。這些對話與爭論不僅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並且能夠「穩定、轉變或是發展某種社會秩序」（頁167）。白氏這種偏重科技如何在既有價值觀限制下實踐物質生活、建構社會秩序的觀點，她稱之為「一種新的物質論」（a new

11 白馥蘭另有專書對明清絲棉紡織生產技術如何重塑當時「性別、工作（work）」之間意義進而衝擊所謂「家父長權威」問題，有更仔細的論證：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本書有篇較詳細書評可參考：連玲玲，〈科技世界中的性別關係〉，《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1998，臺北），259~270。

materialism）。白氏並且做了以下提醒：西方「近代社會科學所建構的各種理性考量，如同現代科技的設計一般，其實是有歷史侷限性的：近代西方人假想了一套可用來滿足消費數量擴增的偏好模式，將生產規模由小變大視為進步，預設了一套所謂的笛卡兒式（Cartesian）身、心分離思考習慣，以及來自道德經驗的特殊美學觀念」（頁207）。

王國斌（R. Bin Wong）的〈農業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當代遺緒〉，開宗明義即點出：「當我們以歐洲發展經驗做為典範時，人類所有其他的歷史發展經驗即顯得異常，我們便開始跟著追問世界上其他地區歷史究竟發生了什麼錯誤。」在此種設問習慣的影響下，所謂的「停滯」（stagnation），便成為形容中國歷史「異常」特色的代名詞（頁210）。然而，在王氏看來，傳統中國不僅確實出現經濟成長，而且這種成長背後也反映了獨特的動力。儘管中國與歐洲內部各有不小的區域性差異，但若進行整體性比較，西元十到十八世紀間的中國與歐洲各自經濟成長經驗，仍然表現出三類共通的演變趨勢：市場交易與長距離貿易的成長；移民帶動的荒地開發與農業技術改良；鄉村工業的擴展（頁215）。這種主要由「商業化」所驅動的經濟成長，共同存在於此時期的中國與歐洲。借用亞當.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對當時市場擴展帶動社會分工、經濟成長所做的分析，王氏稱此現象為「斯密型動力」（Smithian dynamics）。[12]

由西元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間，在中國與歐洲這片「歐亞大陸」（Eurasia）上，都經歷了由「斯密型動力」推進的經濟成長，王氏稱之為「商業資本主義」；然而，中國與歐洲「商業資本主義」則各自處於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political economy）內，雙方用以整合「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建構」（state making）的聯結機制（the fit），具有顯著差異。中國基本上是統一的「農業帝國型政治經濟體制」，而

12 王國斌一九九七年專書*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則更仔細地區分了四類經濟成長動力：由勞動分工與商業擴張所引起、由投資增加所引起、由技術進步所引起、由更有效的經濟組織而提高產出所引起。參見該書中譯本：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56~57。

歐洲則是列國軍備與商貿競爭競烈的政治經濟體制（頁220~221）。儘管明清中國政府並不如某些學界刻板印象所以為的實施所謂「抑商」政策，對於市場運作如何有利國計民生與農民生活，不少明清官員其實都抱持著明確的肯定態度，政府也基本將這種肯定態度落實到各種經濟政策中（頁223）。但是，比起當時歐洲政府著眼增加財稅收入、進行軍備競賽，從而重視商貿稅收並向商人借款，相較於這種歐洲「國家建構」的整體趨勢，中國政府確實不夠重視商業稅收，也比較輕估商人對政府財政的貢獻。

明清政府有兩套基本的經濟政策原則，無論是採行對官營礦場、鹽業「開中」專賣等「直接干預」（activist and interventionist）經濟政策，或是保障市場交易安全、鼓勵民間紳商協助救荒賑濟事業等間接監督（monitoring private sector）經濟政策（頁222）；同時，並實施三大經濟政策：透過獎勵耕織生產、興修水利等政令，推進全國農村的生產事業；持續調查全國各地的糧價季節性波動、降低區域間食糧流通障礙、倡建各類糧食倉儲體系等手段，藉以平抑物價波動與進行財富重分配；鼓勵人民移墾開拓新耕地，平衡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頁226）。王氏認為，明清政府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則與目標，都放在維持社會秩序穩定，而非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或是全體「國家財富」；其基本作法是緩和或壓低江南等富裕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拉低其與國內其他貧窮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頁227）。

兩相對照，歐洲政府則在十六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早期間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經濟政策與基本原則影響下，逐漸確立了以國家「權力」聯合大商人「財富」的「經濟發展」路線，進行諸如壓低工資與降低利率等一系列短期看來不利於一般平民與國內落後地區的經濟政策（頁227）。在整合「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建構」的聯結機制上，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歷史，乃在十九世紀以後出現了較明顯的差異。對王氏而言，問題不在所謂的「前近代」（pre-modern）中國究竟「出了什麼錯」（what went wrong），而是雙方在歷史轉折點上為何出現了不同的「經濟再生產與社會結構轉型過程」。王氏相信，理解其中的歷史轉型差異，將會有助於我們預測未來中國的經濟改革方

向（頁245）。

這本《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論文集，令我受益良多。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文章對歐美學者如何討論歐洲經濟成長「奇蹟」的眾多研究成果，提供了簡要有用的分類與深入閱讀的線索。王國斌、白馥蘭的具體研究，可以思考明清與同時期歐洲政府如何在經濟政策上反映出商業發展與國家建構的不同整合機制，並領略科學技術轉變如何連繫家內勞動分工、政府統治的意識型態乃至社會秩序轉變的不同可能性等問題。另一方面，布魯（Gregory Blue）與卜正民文章，則分別從歐洲人如何透過「中國」認識自己、中國人如何透過「歐洲」認識自己的不同層次，將長期以來由雙方眾多學者所共同建構出來的中國歷史「獨特性」，予以重新分類，並考察各種論述的流派與傳承。

由這本論文集所討論的各類史學論述看來，研究者個人究竟如何定義、認識與評價人類歷史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關連實為重大。不僅影響學者看待自己所處現時世界與本國政治、經濟結構的基本立場；而對於那些專門書寫中國歷史，或是書寫歐、美、日本歷史而旁及兼論中國歷史的學者，其實也都在他們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特定視野下，書寫著各種「中國歷史」。因此，這些書寫內容都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史這面大鏡子下所看到的中國歷史，其實也即是諸種「鏡像中國」。《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論文集的出現，給讀者一個拉近距離、觀看「鏡像中國」如何顯像成形的機會。

那麼，不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這面鏡子來看「鏡像中國」究竟行不行？我想，至少對研究明清經濟史或是物質生活史的學者而言，答案恐怕是：很難避免。較實際的做法，毋寧是回頭檢查自己慣用的比較框架，對那些自己既有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觀念，無論清楚或是模糊，總要經常反省與調整，看看自己慣用的這些比較觀察中國經濟變遷的「鏡子」究係何種「品牌」？自己慣常用以梳理儀容的鏡子究竟是由哪些「廠商」製造、哪些「代理商」流通？進而檢查其中各種由於設計生產或是代理經銷而產生的瑕疵、偏誤或是盲點，若是鏡子上灰塵污垢太多，或是鏡中稜角反射過於雜亂，也要及時妥善處理。總體來看，《中

國與歷史資本主義》論文集提供研究者一個認識鏡子品牌與改善鏡子品質的好機會。當然，有些人堅持自己從不依憑「鏡像」、可以直指中國歷史「本真」，認為自己對中國經濟史的認識圖像本來即從未受任何品牌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任何影響；或者，另有些人則在閱讀、書寫中國歷史時抱著「古為今用、郢書燕說」的態度，但問如何加速中國經濟「發展」、建立「法治」，對於由歐洲資本主義史映照而生的「鏡像中國」究竟是否曲解中國歷史這個問題，有時真也無心講究。讀者若非抱持這兩類心態，則本書必能提供啟發。而隨著本書中譯本新在臺北出版，相信可以便利更多中文讀者領略本書帶來的種種啟發。

*我很感謝審查人對本篇書評的指正與建議，特此致謝。另外，也謝謝沈松僑先生在本文草稿階段所給的一些建議。

（責任編輯：林正慧　校對：鄭坤騰　周如怡）